

# 稻之道，水之道

□ 杨不易

## 一

十多年前的某个午后，找了很久，绕了很远的路，我终于站在了刻着“宝墩古城遗址”字样的文物保护石碑前。布满风雨渍痕的石碑，被一些不知名的杂草包围着，有些落寞，却又透着倔强。正在路边地里劳作的农妇，抬手指着稻田深处一线隆起的土坡说，那就是古城墙。两蓬竹子站在土坡上面，无所谓地随风摇摆。

面对这看上去与别处无异的田野，我有些茫然，不知道可以做什么，只好掉头回城了。

新年伊始，我又来到这里。如今的宝墩古城遗址被认定为成都平原最早的史前城址之一，也是长江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古城遗址、中国龙山时期晚期四大古城之一。1996年首次被正式发掘，成为当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而大致同一时期的这类古城遗址，成都平原还发现了七座。八座古城文化面貌相似、年代前后延续，考古学术界将该类遗存命名为“宝墩文化”。

持续多年的考古工作，取得的成果众多，而让我最感兴趣的，

莫过于在遗址内发现了四千多年前的碳化水稻遗存和水稻田遗迹。它是成都平原发现的最早的水稻田，也是在长江上游发现的最早的水稻田。

这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它意味着，在宝墩这片仍然生长着水稻、小麦和其他农作物的土地上，农耕活动在四千多年间从未中断过。人们往往乐于夸耀一座城市历史的连贯和延续，对于某座偏远的村庄、某一片庄稼地，却没有这样的期待。宝墩古城遗址的水稻田遗迹，让我有了看历史的新角度。

扎根此处多年的宝墩遗址工作站，和新建的天府之根——宝墩遗址与宝墩文化陈列馆，都地处空旷的田野之间，各种农作物在周围肆意生长，有的菜苗地还盖上了防冻保温用的塑料薄膜。塑料薄膜虽然不起眼，却是现代化的农耕用品。它的存在，似乎提示着我们，虽然这片土地一直生长着各色农作物，但人类对它们的利用手段，却比四千多年前强了太多。

人类对水稻的驯化，可能早

在一万多年前就开始了。在刀耕火种的石器时代，要把荒原上的野草驯化成颗粒饱满的农作物，需要非凡的智慧和漫长岁月的坚持。一开始，人们可能只是偶然发现这种野草的种子可以食用，因而开始采摘和栽培，后来才慢慢选取优良的种子，培养它们颗粒饱满又不易掉落的特性，并分化出弱黏性米的籼稻和黏性米的粳稻。

从考古发现来看，宝墩古城先民的农作物以水稻为主，兼种粟和黍。但是，他们是从哪里学会水稻种植的呢？或者是他们自己发现并驯化了水稻？

考古专家从出土的陶器等生活用品入手，分析了宝墩古城先民的来源，认为其中有一部分来自长江中下游，属于以种植水稻为主的良渚先民，他们溯江而上，经过数百年跋涉，最终抵达了成都平原，也将水稻的种子和种植技术带了过来。

## 二

我第一次注意到宝墩古城是在成都博物馆。作为成都历史陈

列的第一个展柜，摆放着在宝墩发掘的几个陶器，其中一个有着三个支架的容器尤其引人浮想联翩，据称这是一个用来煮食物的器皿。

后来，又在宝墩古城的陈列馆看到一个陶制的灶，这是成都平原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灶，号称“成都平原第一灶”。可以想象，当时的人们把装有食物的陶器架在灶上，食物在陶器里热气腾腾，围着的人们口舌生津，面露幸福。

只是，他们煮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们知道了，那柴火熊熊的灶上一定有一种食物是稻米。四千五百年前的稻米做饭是什么味道，已经无从知晓。考古手段和科技可以还原当年的某些情形和工艺，但无法还原当年稻米的滋味。

在离宝墩不远的高山古城，也种植水稻。考古人员采用最贴近几千年前的耕作和生产方法，在当地收获水稻。收割、脱粒、晾晒、脱壳、扬场，用石杵和簸箕这些原始工具得到稻米及稻壳等附属产物，对照出土的碳化稻谷进行研究，期望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

这些诗意的想象，某种程度上给了我错觉，似乎当年的古蜀先民过着丰衣足食的悠闲生活，比我这个生活在现代城市里的人更幸福。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另

一个考古信息，说宝墩古城毁于洪水。翻阅古蜀文明史就会发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一直在和洪水斗智斗勇。在宝墩古城、三星堆古城及与金沙遗址同时期的十二桥遗址，考古人员无一例外地发现了洪水肆虐的遗迹。在十二桥遗址，甚至可以看到被压在洪水印痕之下的竹泥墙址。如此一想，才觉得古蜀先民在成都平原种植水稻的艰难。

种植水稻，不能只有水，更重要的是控制水，悟得用水之道。水稻的生长，需要恰到好处的水量，永远只能浅浅地淹没禾根下部，滋养它们生长、分蘖、抽穗、散籽……水缺则枯萎，水盛则病伏。

稻之道，源于水之道。

四十多年前，当我还年少时，我的老家川东的杨桥或许更能反映真实的古时稻与水的关系。杨桥远离大江大河，几座山梁和两条山沟形成一个浅丘地形的村落，山梁是旱地，山沟里则是水稻田，半坡上则是半年旱地半年水田的所谓旱田。

春天，收割了小麦和油菜之后，我们开始准备插秧。沟里的田叫冬水田，有储存了整整一个冬天的水，只需要翻挖之后就可以插秧。而半坡上的旱田，在收割完小麦或油菜之后，需引水入田。人们架上木制的水车，两个

人躬身摇橹，将沟里冬水田里的水一站又一站地引到坡上的田里。旱田经过一个冬天的干裂，很难留住水。我们只好再去做护水的田埂，用稀泥堵住每一条可能漏水的裂缝。

也许，还会遭逢一个缺水的春旱，连冬水田的水也不够用了。我们只能仰望天空祈雨，可老天毫不理会。

上湾的水库里有水，但他们派人日夜守护着，不愿分给我们。于是村民们便决定去偷水。夜半时分，男人们悄无声息地向上湾出发，妇女儿童静默地守在自家田边。随着上游的水流下来，堵住或打开田埂上进出水的缺口，留下足够且适量的水。有时候，偷水很顺利，一夜之间田里就蓄满了水，然后是上湾人们持续几天的叫骂。有时候，偷水的和守水的狭路相逢，只好大打出手，甚至刀兵相见、血溅当场。可为了下一年的口粮，人们也顾不得许多，乡邻之间反目成仇。

到了盛夏，一旦遭遇山洪暴发，整条沟里便成了汪洋。浑浊的洪水淹没了稻田，只余一点禾尖在水面飘摇。我们站在坡上望水兴叹，知道半年的辛劳或将颗粒无收。洪水退去后，稻禾满田倒伏。伤心绝望之余，又不得不下田去将它们勉强扶起，期望多少能够收获几粒勉强糊口。

## 三

宝墩古城所在的成都市新津区，不仅不缺水，反而容易洪水泛滥。

金马河、羊马河、杨柳河、西河和南河五条河流汇聚于新津城东南的岷江，继而往南奔腾而去，最终在宜宾市与金沙江相汇形成长江。唐代王勃诗句“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五津一说指的就是新津。现在的新津，建了五津廊桥来纪念。新津有了水运优势，但也不得不承受水的凶猛。

岷江水过了都江堰，向新津奔涌而来，加上几条支流汇聚，一遇连日暴雨，便有洪水泛滥的危险。记得多年前，有一次新津洪水暴涨，我作为记者前往采访，只见街边的汽车竟被冲到围墙上。更有一些民众被困于洪水之中，救援人员驾着汽艇来回救援，情势令人揪心。

而宝墩古城遗址位于西河附近，铁溪河则穿城而过。四千多年过去了，虽然河流位置有所改变，但古蜀人择水而居，与洪水不断抗争，又在一次次的洪水之后重建家园，或者迁往更好居住地的痕迹却历历在目。

考古发现，宝墩古城的城墙是单墙，但在墙体之外，又有一

道壕沟，因此既有防敌的功能，也有防洪的用途。可见古蜀人挑选城址，既是择水而居，又要避免水患，用尽了智慧和辛劳。

《山海经·海内经》说：“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杨升庵、蒙文通等认为，都广之野即指成都，可见古蜀时期成都平原的农业极为发达。但在农业发达的背后，是治水的努力。古蜀传说中，有大禹在岷江上游导江分洪的故事，也有鳖灵治水有功而夺权为王的传说。而秦汉时期，蜀郡太守李冰父子主持修建使用至今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被世代称颂。

在新津，还有一处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的通济堰水利工程。通济堰从开创至今亦有两千多年历史，位于新津城东南南河、西河与岷江的汇合处，由拦水大坝、进水闸门、三洞桥、渠道、叶穴等组成，以引灌为主，蓄泄兼备，泽润附近四个县，灌溉面积达52万亩。这既是蜀人治水智慧的实物见证，也说明蜀人与水斗争的历史从未间断。

正是因为掌握了控水之道，古蜀人才能成功大量种植水稻。

宝墩古城成为成都平原稻作文明的发源地和延续之地。稻米滋养了古蜀人，促进了人口增长，因此才有了成都平原城市文明的起源。宝墩古城遗址于是被誉为天府之根、长江上游文明之源。

天府农业博览园是一个现代农业产业园区，2022年刚刚落成，包含成都新津区兴义镇、宝墩镇和安西镇三个片区。宝墩古城遗址自然也在范围之内。而距宝墩古城遗址约十公里的天府农博岛是天府农业博览园的核心区域，曾作为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全国主会场，称得上是体验天府农耕文明的一个窗口。

从天府农博岛前往宝墩古城遗址，穿行在冬天的“稻之道”，虽然看不到欣欣向荣的水稻，却能感受到沉默的田野间正在蓄积力量。待到春天降临，梨花溪便将繁花盛开，人们高喊一声“开秧门”，再次种植下新一年的水稻，延续和传承四千多年都不曾中断的农耕文明，或者某种不可言说的精神。

稻之道，水之道，便是宝墩先民留下的，关于人类生生不息的密码吧。<sup>[註釋]</sup>

（杨不易，本名杨方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